

4-38/60

洮南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政协吉林省洮南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私营建业造纸厂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吴长安 (1)
三九医院的始末	董文元 (7)
陈万忠传略	曹德才 (9)
“天恩地局”由来琐记	葛 藤 (14)
王翼廷题洮南八景诗	王庶昌 (20)
解放前洮南的自然灾害救济	樊秀云 (27)
洮辽镇守使	李玉信 (30)
洮南旧闻拾遗	戴忠春 (32)
吴俊升平息“乌泰叛乱”	(32)
阚朝玺诱歼黑塔	(36)
张海鹏诬杀于焕章	(38)
四洮铁路与洮昂铁路	吴言长 (41)
民国时期洮南县私人筹资办学状况	姜纯良 (48)
解放前的洮南邮政沿革史	樊秀云 (52)
朱瑞其人其事	王正方 (53)
吴俊升在洮南二、三事	葛 藤 (61)

私营建业纸厂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吴 长 安

洮南私营建业造纸厂，经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文化大革命”期间，易名为洮南地方国营东方红造纸厂。现将私营建业纸厂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1949年7月，洮南胜利商行经理成盛三，联合三十六家工商业户，集资35000万元（东北币），在县政府大力支持下筹建造纸厂，取名建业造纸厂。于1950年基建甫毕投产，当时只有一台蒸球，两台打浆机，一台36吋圆网造纸机，仅能生产苇料本色包装纸一个品种，年生产能力400吨，职工只有63人。

建业造纸厂投产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厂方各位股东在经理成盛三的带动下，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合计捐款3亿元购买洮南号飞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另捐款1亿5千万元，协助政府兴办军属毛纺织厂，（第一毛纺厂前身）支援光荣复转业军人和安排现役军人家属入厂工作，解决他们就业和生活困难，为党和政府分忧。

建业造纸厂建厂后，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下，得以迅速发展：1951年总产值为645.42万元，1953年已高到854.310万元，1954年企业登记时年产值增长到1007.167万元，职工人数由建厂时63人增加到

201人。

1953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政策，9月公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至此，全国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县委、县政府按照党中央和省部署精神，开展了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县委抽调政策观念强，有一定工作水平的干部组成县委工作组，进驻建业造纸厂，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由高明月、李殿文等五名同志组成，在县委直接领导下，按照省委部署认真开展工作。

工作组进厂后，组织全厂职工认真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厂方36家股东单编学习小组，使其深入理解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同时按县委要求又将股东家属，组织起来学习有关对私改造文件，提高认识，深刻理解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积极支持亲人接受改造；还将全厂职工按车间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学习有关文件，用党的政策武装职工群众，增强他们政策观念，踊跃参加对私改造运动。

经学习，各位股东对党的改造政策有较清醒认识，有了主动接受改造的愿望，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12月经理成盛三主持召开股东会议，会上学习了党关于“利用、限制、改造”等有关政策，股东们联系实际开展讨论，总结几年来生产经营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股东们说：“我们建业造纸厂，建厂几年来虽然有一定发展，但也存在我们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生产，没能纳入国家计划，产品很难按社会需求进行

生产，生产处于盲目状态，产销不平衡，致使产品积压，企业前途莫测。”该厂从1953年第四季度起产品开始滞销，到1954年5月末厂内积压各种乙类办公用纸250.69吨；另外受公对私现金转帐限制，减少了国营单位从该厂进货的计划，1953年末，长春烟厂准备同该厂签订供货合同，因该厂是私营企业在银行没有现金转帐关系而告吹；1954年中国百货公司四平地区批发站与该厂签订乙类办公用纸100件的购货合同，也因该厂对外没有现金转帐关系而作废；地方国营吉林火柴厂同该厂签定包装纸的进货合同，后来根据先公后私的原则，将合同转让给铁岭地方国营造纸厂。据此种原因使该厂的销售量大幅度下降。面对现实，股东们认为如果不审时度势尽快改变企业现状，该厂就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股东们从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看到，各地接受改造走上公私合营之路的工商企业，同国营企业实行联合，使企业原材料供应有保证，产品销路由国家负责，企业呈现繁荣兴旺新气象，股东很受鼓舞，特别是看到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方代表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有职有权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他们感到个人前途是光明的。学习会上工作组又领导他们学习了《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对股东们鼓舞很大，他们纷纷要求走国家资本主义这条路，实现公私合营。他们一致表示向政府提交自愿要求公私合营申请书。同时决定将1950年至1952年盈余红利全部投给工厂，变作资金，以表诚意。

1954年2月该厂第一次向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要求合营申请没被批准，又于当年5月14日再次向政府奉上《自愿

要求公私合营申请书》，股东们在申请书里表示：“在总路线学习运动中，听各级领导关于总路线、总任务的辅导报告，使我们清楚认识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照耀各项事业发展的灯塔，党对私营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也完全符合私营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因为只有通过‘利用、限制、改造’才能使我们私营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才能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国家向我们私营工商业指出的唯一的光明大道。”紧接着他们又在1954年6月14日第三次向县委、县政府提出申请。

县委、县政府根据建业造纸厂三次申请，鉴于他们从思想上和企业经营条件上已经具备条件，经请示省委，于1955年5月上旬开始对该厂进行宣传教育、清产核资等工作，摸清企业经济情况，掌握职工思想动态，通过教育使全体职工提高觉悟，加深对公私合营的认识。经50多天工作做好了合营前的准备工作，最后经验收，县委、县政府认为该厂基本符合公私合营的条件。

1955年8月，县委、县政府向省委提交《关于批准对建业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的报告》，9月1日中共吉林省委批复，同意洮南县委的意见，批准洮南建业造纸厂为公私合营企业。县委派高明月同志到厂为公方代表，并任该厂党支部书记；任命成盛三为厂长，孙慎武、成志舟为副厂长。是时建业造纸厂是洮南县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

建业造纸厂实现公私合营后，生产飞快发展，企业呈现一派新气象，出现了产品销售快，没有库存积压现象，销售额逐年

上升，实现合营的当年销售总额为106万元，1956年为124万元，1957年为151万元，1958年达到196万元。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上缴利税逐年递增：合营前上缴税金9.4万元，合营后的1956年上缴32万元，1957年为43.8万元；1958年61.7万元，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公私合营后按党的政策规定，县政府对资方人员作了妥善安排，除安排三位私方人员任厂长、副厂长外，还安排几位股东任厂内的行政股长和车间主任，使他们能人尽其才，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1956年5月后，根据党中央制定的赎买政策，规定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配股息红利，5月21日召开合营后第一次股东会议，主要讨论分配1955年9月至12月末股息红利和予借1956年股息红利问题。这项工作政策性较强，对此要格外慎重，为此县委给予具体指导，明确指示：

“将合营后至1955年12月末所得红利按‘四马分肥’原则私方应得的2674884元全部提出。”另准借1956年第一季度股息红利。这样处理后第一次分红每股份实得现金280元；第二次予借现金260元。这样做有利于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扩大政治影响，推动全厂生产发展，付息直至1966年9月停止。

公私合营建业造纸厂，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厂职工努力工作，使其迅速发展，到1966年产品产量达到1531吨，工业总产值达到304.2万元。

1966年10月将公私合营洮南建业造纸厂，改为地方国营洮南东方红造纸厂，时至今日仍为此名。现在该厂已成为

我市利税超百万元的中型企业，近十年来在改革的浪潮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拓前进，为振兴洮南的经济不断做出新贡献。

三九医院始末

董 文 元

1950年7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精神，中国医科大学派出部分技术骨干在安达县（今安达市）组建黑龙江省第二医院，收容解放军慢性病休养员。为适应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该院于同年九月迁至洮南，改名黑龙江省洮南卫生医院。接收志愿军伤病员：1952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后卫第三十九后方医院。战勤医院的宗旨：战时为军队服务，平时为地方服务。

建院初期，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人员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在中共洮南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仅一个多月时间，便首批接收了朝鲜云山战役转下来的伤病员。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只好边收治伤员边扩建医院，当地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共洮南县委政治委员汪洋兼战勤医院政委，亲自指导建院和接收伤病员工作，将比较好的房屋腾出给战勤医院使用。卫生技术人员不足，便从县卫生院（现市医院）抽调一批技术骨干，包括：车启平、陶维尧、李光野等名医，充实战勤医院的医疗工作。1951年春，天津首批志愿医疗队116人在大队长万福恩率领下来洮，增强了战勤医院的医疗技术力量。这时，陶维尧、李光野等先后调回县卫生院。天津医疗队每半年轮换一次，先后共有五个大队。天津医疗队撤离后，又有广东志愿医疗队来洮一次，为期半

年。大队长邝安堃系广东中山医学院教研室医学博士。

建院以来，医务人员、政工和行政干部大部分来自中国医大和黑龙江省卫生干校等。此外，从洮南先后调入医护人员、行政干部和录用工勤人员共416名。

在几次大批接收伤病员任务中，洮南人民共出动担架上千副，马车千余辆次。各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学校的职工都志愿组织了献血队，为志愿军伤病员献血1121人次，给血量达236027CC，挽救了628名危重伤病员的生命。

洮南一区（后改洮南镇）所属各街成立了战勤服务队，大部分是中年妇女，甚至有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也自愿参加了服务队。她们自带洗衣盆和针线等，定期到各所、连为志愿军休养员洗衣服做被褥。

洮南电影院、剧院每年春节都挑选新片和优秀剧目，为休养员慰问演出。大年初一，秧歌队纷纷到院部、所、连向工休人员慰问表演，呈现出军民团结、共庆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

三年来，战勤医院的医务人员，行政干部和工勤人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精心医疗，热心服务，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战勤医疗任务。从1950年11月至1954年6月，共收志愿军伤病员11260人次，治愈率为98.7%。有的重返前线（归队率占25.9%）；有的转到荣军学校学习；有的转业到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工作；有的退伍复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战勤医院完成了它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后卫第三十九后方医院三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总结。

陈 万 忠 传 略

曹 德 才

陈万忠于1923年1月出生在河北省卢龙县贫苦农民家庭。因其家庭生活窘迫，其父子身一人闯关东来到郑家屯。不久，辗转来到古城洮南。1935年，其母携带陈万忠不辞千辛万苦来到洮南与其父团聚。1938年迁居到三十户。（现在洮南市洮东乡）同年，16岁的陈万忠经人介绍去白城梁家木匠铺字号“玉台盛”学徒。1944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修筑军事设施，四处抓劳工，陈万忠被迫去甘南（现在黑龙江省甘南县）。日本关东军视中国劳工为牛马，残害至做，激起了陈万忠等劳工们的强烈反抗。他几次组织伙伴们进行反抗斗争，都不幸被镇压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关了禁闭。压迫、摧残、蹂躏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仇恨。他坚信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了。陈万忠结束了铁丝网内、刺刀下的劳工生涯，于1945年10月回到了家乡三十户。

陈万忠目睹家乡的巨变，喜悦从内心深处迸发。从而，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贫苦人民才能过上耕者有其田，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他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听党的话，以解放天下受苦人为己任，一生交给党安排。1946年。陈万忠自愿

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他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刻苦训练，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在战斗中，他听从命令，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在1947年的彪武战役中，陈万忠所在的连队为尖刀连，执行摧毁敌人防御工事的任务。战斗打响后，陈万忠与战友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勇敢地冲出战壕，在前进中，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身旁，他不幸光荣负伤，失去了双足。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齐齐哈尔荣军医院。伤愈后转到了荣军学校学习。

1950年，陈万忠复员回到了家乡——洮东乡永和村，此时，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年老体弱，弟弟刚刚十二岁，家庭生活十分困难。陈万忠毅然挑起家庭生活这副重担，拄着双拐抬柴做饭，给弟弟缝补衣裳，从来不以一等甲级残废军人的身份找政府要补助、提要求。可是，党和政府非常关怀他，给他家带耕地，他不肯，主动找政府说：“我虽然失去了双脚，但是还有双手，我要自己创造财富养活自己，不给党和人民增加麻烦。”他以惊人的毅力、忘我的精神，练习不用双拐走路，不知摔了多少跤，流了多少血和汗终于不用双拐能走路了。

1951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永和村首先组织起来互助组，并担任组长。他身残志不残，带头参加劳动，种地、铲地、割地，庄稼活样样都能干。互助组成员被陈万忠的毅力、意志所感染了，大家齐心协力战胜种种困难，获得了好收成。陈万忠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经常与党员谈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52年，他终于实现了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被县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并奖励他一台手摇铡草机，一台玉米脱粒机，一匹马。

1953年，陈万忠看到村里有几户人家没有畜力，春天种地有困难，他便主动地与本村共产党员崔志兴一起，把这些人家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取名为“中兴社”。他主动把县政府奖给他的机器、马匹贡献给合作社。这一年，他被选为白城县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常务委员，黑龙江省人民代表，黑龙江省残废军人特等劳动模范，东北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无脚英雄陈万忠》的模范事迹，1954年，他被黑龙江省政府授予无脚英雄光荣称号，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简报《无脚的人》，作家黄冰编写了《无脚英雄》一书在全省发行，省、地、县的领导曾多次到永和村视察指导工作，高度赞扬他“以超人的意志，忘我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号召全省人民向他学习。

1955年，曙光生产合作社成立了。陈万忠被选为社主任，他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破除在民间打井跑风水的封建迷信思想，在隆冬季节，带领广大社员顶风雪、抗严寒，克服种种困难，打井210眼，为战胜旱灾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7年，洮儿河水泛滥。全社2500口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陈万忠不顾自己身残体弱，日夜带领广大社员筑堤防汛，终于保住了大部分房屋与财产。洪水过后，他还把自己家的房子倒出来，让给受灾的社员住，还积极地组织社员抗灾自救，重建家园。这年，他还应沈阳部队的邀请，到军区给官兵作报告，受到军区首长的尊敬和战士的爱戴，沈阳军区司令部赠给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永不残废的人”。

1958年，社里为抗旱买了一台煤气机。可是没人会开，陈万忠，拖着他那残废的身躯去拜师学艺，经过一周时间的用心

学习，就初步掌握了机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回来后，他用一条毯子搭起了简易窝铺，连续七昼夜灌地30垧，在大旱之年夺得丰收。这一年，晓光生产合作社被县里评为“丰产管理区”，中央和部分省的参观团曾到这里参观。

1958年，陈万忠担任副乡长和党委委员时，为了使乡里孩子们都能够上学读书，他把自己家里的房子腾出来供学校用。同时还把自己的脱谷机、大缸、檩子等无偿交给大家使用。

1959年修运河，陈万忠担任红旗营营长。他从早3点到晚9点与社员们一起战斗在工地，胃病犯了，他不吭声，公社领导几次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县委派人给他送来了10斤猪肉，他不肯自己吃，把猪肉送到食堂给全营的同志们改善伙食。红旗营在他的带领下，第一名提前完成任务，被县评为模范营。

1962年，他担任乡铁木联合厂党支部书记。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次发放物资供应券时，他都是先发给每个工人，自己少要或不要。工人李忠全家人口多，口粮不足，陈万忠便把自己家的37斤高粮米送到了李忠全家，李家看到了这珍贵的米袋，不禁热泪盈眶。1970年6月，旱情严重，他带领几名同志去三好大队组织社员抗旱。6华里的路程，对他来说，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到达目的地时，殷红的鲜血印在地上。此刻，社员们看到这一切，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1956年至1959年间，陈万忠曾被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吉林省军区政治部把他的事迹编印成册，题为《无脚英雄》。吉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战地黄花》连环画册，介绍了他的事迹。他还两次进北京参加全国

烈军属残废复员转业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合影留念。在会议期间还与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的爱人仇会英、《林海雪原》中的孙达得、狼崖山五壮士中的葛振林等英雄及英雄家属一起座谈，合影留念。并且一起应北京市部分中学邀请作报告，给北京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3年，陈万忠身患重病，在住院期间，县委、县政府、县民政局、县武装部等部门的领导多次到医院探望。4月13日，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陈万忠的一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党和人民政府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他身残志不残，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不骄不躁，不功高自居，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家乡，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永远是洮南人民学习的榜样。

“天恩地局”由来琐记

葛 藤

座落在洮南兴隆街中段北侧有一古建筑——“天恩地局”。“天恩地局”始名于清末光绪皇帝赐封札萨克图郡王旗“蒙荒行局”而来。

“天恩地局”由来八十多年，历经五世沧桑。几度易主，历史几许，后人何晓！拙笔成文，以飨读者。

一、郡王封地（1688—1902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东徙外蒙“喀尔喀三汗”之一札萨克图汗子孙部落于内蒙科尔沁草原，洮儿河畔水草田生息。以避蒙古厄鲁特部的骚扰和进袭，赐以“包”姓（或“鲍”姓）。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对蒙古实行“众建”政策，分割盟、旗。分科尔沁部为左右翼六旗，右翼三旗是：科尔沁右翼前旗（原旗所在葛根庙西四品镇）、科尔沁右翼后旗（旗所在苏鄂公府，今察尔森）和科尔沁右翼中旗（旗所原在高力板，今迁白音和硕）。谓“互不相属，世治其民”，始创蒙旗世袭制。

清廷因虑蒙古民族最富有斗争传统，又用“羁縻怀柔”手段，笼络内、外蒙古上层分子，赐以“亲王旗、郡王旗和公爷旗”。“郡王旗”就是清廷近支皇族格格（公主）嫁于内、外蒙

古王公子孙的旗王封地。

札萨克图郡王旗即今科右前旗。札萨克图是蒙语“旗长领地”或译“旗王封地”，是札萨克图汗后裔王公子孙的世袭封地。因系清宗室封爵加“多罗”封号（属理藩院“理”之意）。

二、蒙荒行局（1902—1904年）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之后，札萨克图郡王旗传至十二代郡王乌泰时，因袭爵兴讼，迭遭参控；屡借外债，无力偿还。故私放蒙荒，招垦汉民；私吞荒餉，有待异举。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兵、户两部尚书增祺与裕德会奏慈禧“改私放为官放”：一可筹“练兵之餉”；二可押“乌泰外债”，即能“充实蒙边”，又能“以蒙养汉”，国民两利，一举双收。后颇大悦，硃批允准。后乌泰抗旨拒“官放”，是年六月六日，清廷下谕：“革去乌泰札萨克职（旗长），留任三年，以观后效。”并谕旨首立“札萨克图蒙荒行局”，开放洮、蛟两河沿岸生熟荒地，沃野千里，宜于耕种。

同年秋，清廷赐印委官于辽源州（郑家屯）布告戳牌“蒙荒行局”（当如今之“农垦局”）。内旗外户，闻风而来，争先购荒，广为开垦。十月小阳春，“萨鸡”建城，“双流”始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夏，迁“行局”于双流镇，同年秋“洮南设治”，三十年“升府”。“蒙荒行局”乃洮南府之前身。

三、御赐“天恩”（1904—1905年）

“行局”升府，洮南设治，遂成东蒙重镇。奉黑两省商业